

#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稿件编号: jz25-369

题目: 人工智能在心理传记学中的应用可能、挑战与启示

作者: 舒跃育 李春江 任笑笑 谢霞 张银霞 宋欢

## 第一轮

### 审稿人 1 意见:

这是一篇立足心理传记学、面向大语言模型时代的综述评论稿件。文章从质性研究方法的伞概念出发,聚焦心理传记学中“悬疑性问题”分析路径,系统讨论了大语言模型在“选择传主—提出悬疑性问题—资料筛选与编码—理论选择与发展—研究有效性考察及写作”各环节中的赋能可能,并进一步辨析了价值观偏向、虚假合理性、语义理解局限、主体性危机等挑战,最终提出本土化大模型构建、人机协同研究流程与 AI 应用伦理准则等应对路径。

整体来看,选题前沿、问题导向明确、材料翔实、观点鲜明,特别适合本刊“综述评论”栏目,对于正在思考“如何在 AI 时代开展质性研究和心理传记研究”的读者具有启发性。与此同时,从“顶级综述评论”的标准来看,当前稿件在结构收束度、文献综述的系统性、核心概念与创新点的突出方式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较为实质性的修改。

### 意见 1: 按“科学问题—理论与实证讨论—解决路径”的逻辑重构结构

目前引言中已经用“本文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方式做了自检,但正文结构仍略带“教科书式+研究论文式”的混合感。建议:

在引言的最后,用 2-3 句话非常清晰地列出本文要聚焦的一个主问题+2-3 个子问题,例如:

o 主问题: 大语言模型能否、以及如何在损害心理传记学学科本质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方法论上的助力?

o 子问题: ①在“悬疑性问题”导向的心理传记分析流程中,大模型在哪些环节具有技术优势或辅助价值? ②这些应用会带来哪些系统性风险和挑战? ③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

构建怎样的本土化模型、人机协同范式和伦理原则？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深入审阅与宝贵反馈，尤其是给出了“科学问题—理论与实证讨论—解决路径”的具体优化逻辑，为本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重要方向。在重新审视本文的过程中，确实发现文章的问题导向依然不够明确。通过吸取专家的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文章的写作逻辑，调整了文章结构（如在引言部分之后新增了一个题为“大语言模型为质性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章节，对大语言模型与质性研究结合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将原文的第二、三、四部分的大小标题和内容安排，按照引言提出的问题顺寻重新进行了拟定和撰写，在修改后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四、五部分），并在引言结尾重新凝练了本文要研究的主问题与子问题，使文章内容更加聚焦于“问题”导向。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引言部分标蓝字段，p. 5）：

心理传记学是质性研究中关注典型个体的代表性方法(黄希庭, 2021, pp. 127–129), 以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与生命的独特性为核心, 旨在通过分析那些遗落在定量研究视野之外的“另类个体”来发现已有理论的不足, 促进心理学理论的完善并推动学科发展(蒋怀滨, 张斌, 2019, p. 313; 舒跃育, 2018, 2024)。但传统心理传记学研究依赖对海量文本的手工处理与反复解读, 耗时耗力, 令许多研究者却步。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语言模型“已经在语义‘理解’、知识抽取、‘发现’隐含的逻辑关系以及知识归纳方面, 表现出了强大的处理能力”(舒跃育, 2024), 有望在提升编码效率、支撑理论创新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颜文靖, 2024)。在这一技术背景下, Mayer 和 Fouché(2025)提出了心理传记 4.0 的概念, 主张心理传记研究必须跟随时代发展潮流, 发扬心理传记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价值。那么大语言模型如何在不损害心理传记学学科本质的前提下, 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具体而言: (1)在以“悬疑性问题”为核心的心理传记学分析模式中, 大语言模型可以在哪些步骤为研究者提供有效支持? (2)在应用于各步骤时, 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3)为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 应构建怎样的伦理准则、研究范式或指导框架? 要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考察大语言模型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意见 2：**后续各大部分标题与小节安排, 尽量与这些问题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避免出现“问题提出在 A 部分, 关键讨论分散在 B、C 部分”的情况。这样有助于提升文章的整体收束感。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深入审阅与宝贵反馈。在重新审视本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原文在标题与问题对应方面不够严谨，导致出现了讨论分散的情况。在重新梳理了文章架构之后，我们对每部分的标题与内容进行了修改，使问题与讨论相互对应，避免对某一内容的讨论过于分散，从而提升了文章的整体收束感。具体修改如下：

表 1 文章结构调整表

原文结构	修改后的结构	修改内容
1 引言	1 引言	1 参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在引言部分提出了一个主问题和三个子问题，使文章的结构和论述更加聚焦
2 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的应用可能	2 大语言模型为质性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 在引言之后，新增了关于“大语言模型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相关的文献综述，为后文引出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的应用做铺垫
2.1 选择传主	3 大语言模型如何推进心理传记学研究	
2.2 提出悬疑性问题	3.1 快速定位备选传主	
2.3 资料的选择与分析	3.2 高效收集可能资料	
2.4 解释理论的选择与发展	3.3 跨领域提供备选理论	
2.5 研究有效性的考察与文章撰写	3.4 高效识别理论盲点	
3 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应用的挑战	3.5 协同优化文本矛盾	
3.1 价值观偏向与解释偏差	4 大语言模型给心理传记学带来的挑战:主体性危机的多重表现	3 修改后的第三部分为原文的第二部分。参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对本章节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了重新凝练与优化。将原先按研究步骤呈现的标题改为了按技术特点分类，并增加了大语言模型与心理传记研究契合或不契合的讨论，使其更贴合引言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增强文章的收束感。
3.2 生成内容的虚假合理性	4.1 有偏见的输入:数据污染与内嵌的价值观偏见	
3.3 语义分析的技术局限	4.2 有偏差的输出:虚假内容与偏见叙事的生成	
3.4 数字技术崇拜中的主体性危机	4.3 根本的鸿沟:语义理解局限与意义生成缺失	
4 人工智能时代下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启示	4.4 主体的退场:研究者在技术流程中责任主体的让渡	
4.1 本土文化挖掘与大语言模型构建	5 技术发展引发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中主体性危机的应对	4 修改后的第四部分对应原文的第三部分。参照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重新梳理了四个挑战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冗长的论述内容进行了简化。
4.2 研究者主导下的人机协同关系	5.1 加强本土文化数据库的建设以应对数据偏见与跨文化解读	
4.3 伦理风险的规避与原则构建	5.2 完善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应用的伦理原则以明确研究者的主体责任	
5 结语	5.3 构建研究者主导的人机协同研究流程以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补	5 修改后的第五部分对应原文的第四部分。参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将对这部分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了修改，使其与前文的内容更加呼应，并将能够以图表呈现的内容进行了图示化。
	6 结语	

意见 3：提升文献综述的“结构化感”

本刊的“综述评论”通常希望读者“一眼看出这个领域目前的版图和缺口”。建议在现有文献基础上：

(1) 单列一个小节，对“AI与质性研究/心理传记”的文献进行结构化归纳，例如：

- o 按学科领域：（教育、临床、组织、文化心理/心理传记）
- o 按技术路径：（传统文本挖掘 vs LLM；单一工具使用 vs 流程化人机协同）
- o 按研究功能：（资料检索与预处理、编码辅助、理论推荐、写作与审稿模拟等）

(2) 将代表性研究做成简表或框架图，用1-2幅图帮助读者快速了解“目前别人做了什么/哪些还没被做”。然后再顺势引出本文在心理传记学领域的独特贡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出的建设性意见。通过重新梳理本文的研究框架，我们在引言之后，新增了一个章节“大语言模型为质性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文第二部分），从研究功能的角度（资料检索和预处理、编码辅助、理论生成与验证、写作与结果生成）对大语言模型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出大语言模型当前在质性研究中的主要应用环节以及具备的优势和挑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出了心理传记学作为质性研究中关注典型个体的代表性方法，如何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坚守其学科的特色，并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后文的论述框架。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第二部分，pp. 5-7）：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尝试探索运用大语言模型开展各项质性研究(Gibson & Beattie, 2024; Hamilton et al., 2023; Morgan, 2023; Smirnov, 2025; Zhang et al., 2023)(见表 1)。在资料检索和预处理方面，大语言模型被用于数据转录、内容翻译等基础性预处理工作，以减轻研究者的负担(Barrera et al., 2025; Chen, 2023; Chopra & Haaland, 2023)。在编码辅助方面，通过设计特定提示框架(Zhang et al., 2023)或将经典分析方法流程化(Anakok et al., 2025)，能进一步提升大语言模型在识别描述性主题方面的准确性(Brondani et al., 2024)，并与人类研究者互为补充(Hamilton et al., 2023)。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大语言模型对深层隐含主题的解读仍存在局限(Morgan, 2023)。在理论生成与验证方面，大语言模型可以基于海量数据资源和跨领域知识库，帮助研究者发现尚未考虑到的模式，增强结果的可靠性(Hitch, 2024)。但也有学者认为，需警惕其可能推动方法论向实证主义范式回潮的结构性风险(Chatzichristos, 2025)。在写作与结果生成方面，大语言模型已能协助生成研究初稿、撰写文献综述(傅安国, 岳童, 2024)，并通过与传统方法比较，辅助完成代码书编制等工作(Perkins & Roe, 2024)。但

有研究表明，研究者对“使用 AI 撰写论文”的接受度和伦理认可度在所有功能中最低，审稿人同样对作者使用 AI 写论文的做法持最消极的态度(Marshall, & Naff, 2024)，这表明在多大程度上使用 AI 面临争议。

总体而言，大语言模型的融入带来了显著的效率优势，如节省时间、减轻编码强度(De Paoli, 2024; Mathis et al., 2024)，并能处理人力难以应对的大规模数据集(Tschisgale et al., 2023)。但也带来了价值观偏见(Liang et al., 2021; Navigli et al., 2023)、人类主体性丧失(Marshall, & Naff, 2024; Jiang et al., 2021)等风险和挑战。当未来的科研生态不可避免地“AI——人类协作模式”迁移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能不能用 AI”，而是“如何更高质量地用 AI”(He & Bu, 2025)。在这一趋势下，心理传记学作为质性研究中致力于深度诠释个体生命独特性的代表性方法(黄希庭, 2021, pp. 127–129)，如何在利用智能工具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坚守其基于深度人性理解与叙事整合的学科内核？下文将以“悬疑性问题”心理传记分析模式为例，具体探讨大语言模型在其中的优势、挑战与启示。

表 2（正文中为表 1）大语言模型在不同研究环节的应用情况示例

应用环节	应用案例	应用效果	潜在挑战与风险
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数据熟悉与摘要生成 (Anakok et al., 2025); 转录与翻译(Barrera et al., 2025)	自动化效率高，但对文化语境的适应性不足，缺乏人类深度的语境理解。	语义理解局限；数据偏见
编码与主题分析辅助	自动编码(Tschisgale et al., 2023); 识别与生成主题，主题审查 (Anakok et al., 2025)	在描述性主题识别、关键词提取和信息初筛方面准确率较高，能够提升编码效率，但容易忽略边缘性语境细节，需人工审核。	数据偏见；透明度不足；研究者主体性削弱
理论生成、验证与拓展	识别人类研究者可能忽略的模式 (Hamilton et al., 2023); 基于特定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数据，激发理论对话(Gur & Maaravi, 2025)	在模式发现和基于已有理论的推演上表现出潜力，但自主生成原创、系统化理论的能力仍有限。	认识论冲突；去人性化风险；责任归属模糊；降低理论敏感性
写作与结果生成	研究结果综合与撰写(傅安国, 岳童, 2024); 代码书编制(Perkins & Roe, 2024)	在遵循学术规范的结构化、标准化文本生成方面效率较高。但生成的文本往往流于表面综合，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论证张力和个人化的学术声音。	学术诚信与原创性危机；叙事同质化；伦理敏感性缺失；人类主体性丧失

意见 4: 进一步凸显三项创新点, 并与正文形成更紧密的互证

自检报告中提到的三点创新非常清晰:

- 本土文化语料驱动的大模型循环范式;
- 研究者主导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
- 适用于心理传记学的 AI 应用伦理准则。

建议:

(1) 在正文中, 用小标题或图示的方式将这三点显性化, 而不只是在文字中“顺带提出”。

(2) 每提出一个框架/原则, 尽量回扣前文的具体例子: 例如“为何 DeepSeek 在李清照再嫁问题上出现‘静态二元’解释偏差? →这正说明人机协同中理论判断必须掌握在人手→因此提出某条伦理或流程节点”。这样可以增强“由问题推导到解决路径”的逻辑感。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这一建议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内容的逻辑性和结构化程度。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本次修改过程中, 对于每一部分的小标题都进行了优化调整(见上文回应的表 1), 使其更符合问题导向的标题模式, 并在前文的论述中为创新点的提出进行了铺垫, 使其能够贯穿文章的主线, 而不仅仅是在最后部分突兀地提出。同时, 将创新点中可以进行图示化表达的内容进行了图表呈现。此外, 我们还将文中所举的例子贯穿在全文中, 指出某一示例既是大语言模型促进心理传记学研究的表现, 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 又推导出了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应用带来的主体性危机的深层挑战, 最终提出了应对主体性危机的可能路径。部分修改如下(5.1 部分的图示化呈现, pp. 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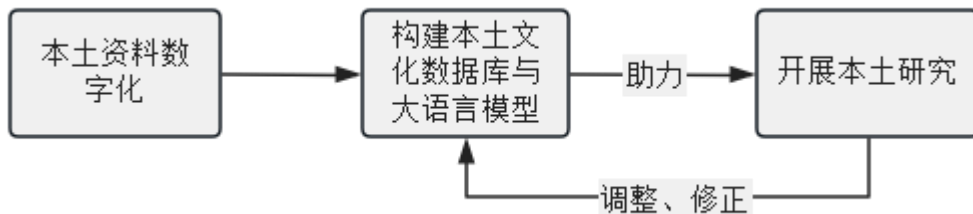


图 1 本土文化数据库驱动的大语言模型与研究循环

意见 5: 在摘要中也可更加明确地用 2-3 句话概括这三项创新, 使读者一开始就能感知到本

文的独特价值。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修改过程中发现，之前版本的摘要部分确实对本研究的创新点论述不够，不容易让读者直观了解到本文的价值所在。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在摘要部分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论述得更加明确，使其既容易让读者理解，也更突出本文的学术价值。具体修改如下(正文摘要部分，p. 5)：

……面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三点可能的解决路径：第一，构建本土化大语言模型资料库，为应对文化语境与数据偏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第二，提出心理传记领域的人机协同伦理准则，为人工智能时代心理传记研究的规范发展提供指引；第三，提出构建以研究者为主导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的理论构想，为心理传记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方法论路径指明方向。

#### **意见 6:**精简部分技术细节，突出心理学和心理传记学视角

当前稿件对 NLP、Transformer、自注意力等技术细节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有利于非计算机背景的读者理解，但也使文章篇幅、信息密度偏高。建议：

保留对“心理传记研究真正相关”的关键技术逻辑（如 RAG、主题建模、矛盾检测、立场检测、多模态分析），但可以用更紧凑的语言、更加心理学化的比喻方式来表述，避免长篇技术综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考虑过是否要减少对技术部分的论述，但为了方便非计算机背景的读者理解，对此部分进行了保留。原文中关于技术部分的过多介绍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通过对您之前建议的回应，我们对全文的逻辑框架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一些冗长的技术部分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对语言进行了优化，并将重点篇幅放在对“技术与心理传记的适配性”等内容的讨论上。具体修改示例见下一问题后（正文第三部分，pp. 7-14）。

#### **意见 7:**将篇幅和论证重点更多放在：

- o 为什么这些技术适合或不适合处理“悬疑性问题”和“异质个体”？
- o 它们如何改变心理传记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和认识论位置？

这将更有助于凸显“心理学/心理传记学视角的评论”，而不是一篇技术综述。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关于“为什么这些技术适合或不适合处理‘悬疑性问题’和‘异质个体’？”的问题，我们在原文的4.1部分有所提及，但讨论的力度还不够。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大语言模型的技术逻辑是基于已被数字化的资料的总结归纳。当我们向其询问一个问题时，它所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基于已有数据中反馈最多的情形。这也是为何大语言模型提出的理论缺乏创新性的原因。但由于论证的篇幅偏少，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在文章第三部分“大语言模型如何推进心理传记学研究”的每一小节中，除了论述大语言模型对心理传记研究的推进作用外，还增加了对“该技术与心理传记的适合/不合适”、“对研究者工作方式和认识论位置产生了何种影响”内容的讨论。具体修改示例如下（详见正文第三部分，pp. 7-14）：

……二是选择依据是基于对人物的熟悉程度，还是基于对某一理论视角的兴趣。如陈雪仪(2021)因在课堂上学习了林徽因相关的内容后，被其所散发的“生命光芒”吸引而进行的心理传记学研究，是基于对人物的熟悉程度。理论选择则是在研究者明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寻找契合这一理论立场的传主开展研究。如王泽钰(2022)因其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倾向而对封建社会中站在权力巅峰的武则天和慈禧情有独钟，便是在理论视角指导下的多传主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

当研究者基于对人物的熟悉度选择传主时，并不需要大语言模型的参与，因为传主是已经确定的。而基于理论视角选择传主时，人工智能便可以帮助研究者初步筛选出与该理论相关的传主。例如，我们想要寻找与“真实自我”理论相关性较高的传主，通过将要求输入大语言模型，其给出了辜鸿铭、维特根斯坦、张爱玲等人物。这种从海量数据中进行筛查的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技术可以“将传统的语言生成模型与外部知识源相结合，提升大语言模型的检索能力”(秦小林等, 2025)，根据研究者的标准，从海量信息中初步筛选出可能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实这些人物的成长经历，以确定是否适合做为自己研究的传主。尽管其给出的结果存在一定误差，但无疑大大减少了研究者从无到有确定传主的工作量。

然而，大语言模型这种基于海量数据与模式匹配的推荐能力，在心理传记学的传主选择上存在固有的认识论局限。首先，其推荐机制本质上是“回溯性”和“强化主流”的。模型倾向于推荐那些在训练数据中被高频讨论、史料丰富的人物，如辜鸿铭、张爱玲等。这无形中巩固了既有的历史名人谱系，而可能将那些同样极具心理研究价值、但因其边缘地位或史料散佚而未被充分文本化与数字化的“异质个体”排除在视野之外。例如，一位在地方志中

仅有零星记载、却以独特方式反抗时代性别规范的女性，很可能无法被大语言模型捕获。其次，大语言模型的“高效”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它将研究者的探索，从一种充满个人洞察的“主动追寻”，部分地转变为对算法给出的、符合公共叙事的清单的“被动筛选”。当王泽钰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武则天和慈禧产生兴趣时，其背后是对权力与性别交缠复杂性的深层追问，这种追问的独特视角是关键词匹配无法企及的。因此，研究者必须警惕，避免自身的研究目的被技术的可见性框架悄然塑造。

#### 意见 8：加强对“实证示例”性质的界定与方法说明

文中多次使用 DeepSeek 对李清照、宋高宗等进行“实验性操作”，并与人类研究者编码或理论选择进行对比，这非常有启发性。但作为综述评论类稿件，建议在方法层面进一步澄清：这些例子属于“启发式示范/思维实验”，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实证研究，建议在文中对其性质做适度界定，避免读者误以为是可完全复现的实证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确实缺少对实证示例的性质界定与方法说明，对于这种不严谨的论述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再次感谢您的细致和严谨。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文章第三部分“大语言模型如何推进心理传记学研究”通过脚注的形式对文中所使用示例的性质进行了标注说明（见正文第三部分段首语，p. 7）。

对本研究中运用大语言模型举例的脚注：

本文中所有运用大语言模型进行的分析，不同于以往实验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模式，而属于为本研究提供论据的“启发式示范”。

#### 意见 9：如可能，可在附录或方法小节中简要说明：

- o 使用的大模型版本与调用方式；
- o 输入提示语的大致结构；
- o 评估“AI 输出 vs 人类判断”的基本标准。

这样既不需要大幅扩展篇幅，又能增强论述的严谨性和透明度。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本此修改过程中，我们在文末新增了附录部分，将使用的大语言模型的版本、使用方式、操作过程等内容进行了示例说明。同时，在不影响文章整体逻辑的基础上，将原文中一些涉及到运用大语言模型验证的内容放到

了附录部分。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文章对主要研究问题的聚焦性。具体修改如下（部分示例，详见正文附录 A-E）：

#### 附录 A

本文在分析时所使用的的是基于 ima-AI 智能体的 DeepSeek V3.2 大语言模型。

之所以选择 ima-AI 智能体是因为该智能体能够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个性化的生成相关知识库。本文在使用过程中，将《女性真实自我的寻求：以李清照的心理传记学分析为例》一文中所使用的分析资料单独建立了一个知识库，使得后续的分析结果都是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网络信息对分析结果的污染。

之所以选择 DeepSeek 作为分析的大语言模型，是因为该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而与其他大语言模型相比，DeepSeek 的中文理解与学术文本生成能力相对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内容。

此外，本文中所有运用 DeepSeek 进行的分析，不同于以往实验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模式，而属于为本研究提供论据的“启发式示范”。

在评估大语言模型的结果与人类判断何者更优方面，我们是基于其回答的真实性、逻辑性和创新性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例如，在进行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判断大语言模型收集的资料是否可靠时，是通过对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对。在判断大语言模型推荐的理论是否恰当时，通过将其推荐的理论与传主的生命故事相结合，判断其解读的逻辑是否符合人类的正常思维方式。在识别理论盲点并提出创新点时，是通过考察是否提出了原有资料中并不存在的新概念，以判断该创新点是对已有资料归纳总结的“伪创新”还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创新。

**意见 10：**对“价值观偏向、虚假合理性、语义局限、主体性危机”的讨论再做适度凝练与深化

第三部分关于挑战的四个小节写得很扎实，但信息略多，建议：

考虑用一段“总括性的小结”串联四个挑战，指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例如：

o 数据与价值偏见→虚假合理性与深度伪造→语义理解局限→研究者主体性被削弱。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出的建设性意见。在对本部分内容重新进行了仔细阅读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价值观偏见、虚假内容生成和语义理解局限等问题更偏向于技术层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是有解决的可能的。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的问题——人的主体性危机。无论是大语言模型在数据源蕴含的价值偏见，还是由此生成的虚假内容，亦或者是对语

义和语境理解的局限性，都有赖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的自反性来觉察。如果研究者缺乏这样的自反性，反而觉得用机器得出的结果更合理、更客观，那将会逐渐丧失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因此，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论述了这些问题之间的递进逻辑，并最终指向对研究者主体性的冲击和削弱。具体修改框架如下（见正文第 4 部分，pp. 14–18）：

#### 4 大语言模型给心理传记学带来的挑战：主体性危机的多重表现

##### 4.1 有偏见的输入：数据污染与内嵌的价值观偏见

##### 4.2 有偏差的输出：虚假内容与偏见叙事的生成

##### 4.3 根本的鸿沟：语义理解局限与意义生成缺失

##### 4.4 主体的退场：研究者在技术流程中责任主体的让渡

**意见 11：**适当压缩与已有伦理讨论高度重合的部分，把更多篇幅留给与“心理传记学情境”高度相关的独特风险（如非匿名著名人物、历史人物、无法取得知情同意等）。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出的建设性意见。在重新审查心理传记学研究所面临的独特风险和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风险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认为两者并不属于同一维度。关于“非匿名性”、“无法取得知情同意”、“历史人物”等伦理问题，已有前人研究对此进行了回答（参见舒跃育等人的《作为分支学科的心理传记学：当前困境与应对》一文）。而本部分内容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心理传记学领域带来更多的伦理风险。因此，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通过结合心理传记的研究步骤，给出了每一步骤中具体如何避免的伦理原则。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 5.2 部分，pp. 19–20）：

自 2023 年起，论文中使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比例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仅有 0.1% 的作者在正文中明确披露曾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写作辅助(He & Bu, 2025)。在人工智能的使用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如何规避大语言模型的加入给心理传记学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学术共同体需要构建并完善人工智能在心理传记学中应用的伦理原则，明确研究者在使用人工智能时的主体责任与行为边界，并将系统的伦理审查贯穿研究始终。基于前文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原则可供参考：

**人类主体性与责任归属原则。**在心理传记的研究中，大语言模型应被严格限定为一种“辅助工具”，研究者必须始终保持自己在研究中的主体性。在研究过程中，所有使用 AI 生成的内容，研究者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核查、批判与整合。在发表研究成果时，研究者必须明确披露 AI 在研究中的参与程度和具体用途，最大限度地保持 AI 使用的透明度。在责任归属

方面，AI 不应也不能成为独立的作者，研究者始终是研究和论文等学术成果的第一责任人。

**公平性与偏见修正原则。**在使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心理传记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要始终保持自身的批判与反思能力，主动识别并修正算法偏见。包括：审慎选择和分析训练数据可能存在的缺陷；在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文本分析时，采用多种理论视角进行交叉验证；将研究结果放回到传主所处的具体历史与社会文化语境的理解中，避免被模型的“平均化”输出所误导。

**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强化原则。**心理传记学研究往往涉及大量与传主相关的私人资料（如私人信件、日记、著作等）。这些资料的使用应严格限制在本土语料库中，在输入方面，要对资料进行多重清理，确保消除可能包含的污染数据。在输出环节，严禁将可识别传主身份的敏感原始数据直接输入公共大语言模型，以防数据被用于模型训练而导致信息泄露。

**风险预防与动态治理原则。**鉴于大语言模型可能被“指令攻击”诱导生成有害内容(陈晋音 等, 2025)，以及心理传记学研究本身可能对传主声誉、其后人或相关群体造成的潜在影响，必须建立“风险——价值”评估机制(舒跃育 等, 2021; Ponterotto, 2018)。在研究前，研究者需说明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及潜在影响，供伦理审查委员会评估该研究的必要性。在研究成果发表时，期刊需要考察其研究逻辑与结果是真实或合理的。若研究发表后引发争议，应提供伦理申诉渠道，并进行公开回应与处理。同时，鉴于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的快速性，伦理规范也需定期复审与更新，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新的问题。

上述伦理原则明确了研究者的责任边界，而要将其落到实处，则需要具体的研究流程设计中，确保人类智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实现有效的人机协同。

#### 意见 12：语言和格式方面的细部打磨

(1) 检查全文中技术名词和心理学术语的写法是否统一（如“大语言模型/预训练大模型/LLM”等），尽量在首次出现时给出中文+英文简写。

(2) 外文人名、文献格式建议再对照期刊体例做一次系统核对。

(3) 个别段落较长，可适当拆分，以减轻阅读负担。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细致和严谨对本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为本文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首先，我们对于文章中首次出现的心理学术语和技术名词，除中文之外都标注了英文名称及其简写，并且对于整篇文章中出现的专业术语的统一性进行了仔细检查，切实避免同一内容不同表述的失误。其次，我们再次对照期刊要求，

对本文中所有的外文人名、文献格式进行了系统核对，切实避免文章中出现书写错误。最后，对于段落较长造成的阅读负担我们深感抱歉。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在重新梳理研究框架后，对整个文本的内容结构进行了优化，以避免出现过长的段落内容，对读者造成阅读负担。

**综合建议：** 综上，本文站位前沿、视野开阔，在“AI 时代的心理传记学方法论反思”这一主题上已经打下了扎实基础，尤其是对大语言模型在具体研究环节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分析较为深入。若能根据以上意见在结构重组、综述架构、创新点呈现方式和示例一理论的对应关系方面做出较大幅度修改，有望成为在本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综述评论文章。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选题的认可和鼓励，特别对您所提出的大量有助于完善本文的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深表感谢！

.....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心理传记学研究中的应用可能及面临的挑战，文章按照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各个步骤进行了应用举例，并提出构建本土化大语言模型资料库、倡导以研究者为主导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该文在方法学上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对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具有潜在性意义。有以下几点意见供作者修改参考：

**意见 1：** 作者在“2.1 选择传主”部分提到，选择传主靠直觉和理论，如果靠直觉选择传主，这里的直觉指什么？人工智能技术能否进行应用？需要在文中给予阐述和说明；如果靠理论来选择传主，传统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感觉文中的阐述存在可操作性和逻辑跳跃性大的问题，例如，文中提到：“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和标准，从海量信息中初步筛选出可能的研究对象。”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在仔细审视文章后，我们发现“直觉”一词的使用可能不太恰当，具有一种非理性的神秘色彩，确实会让读者产生疑问。原文中我们提到的直觉主要是指，研究者在对传主的熟悉度、资料的丰富性和可获得性以及社会历史评价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正如研究者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往往会以本课题组的研究传统或研究者熟悉的领域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所以，人工智能技术在

这一选择过程中是不会参与的。为了避免读者对此产生误解，我们对原文中的表述进行了修改。

原文中提到的理论主要是指理论立场或视角。在传统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者是基于自己的理论立场选择传主时，需要在一个大的理论范围内去寻找适合这一理论的传主。而这样的选择过程往往要求研究者拥有足够的对诸多人物的知识储备。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的高效检索能力，能够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帮助研究者快速选定备选人物，尽管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依然能够减轻研究者的任务负担。

关于“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和标准，从海量信息中初步筛选出可能的研究对象。”这一点，我们吸取审稿专家的建议，通过运用大语言模型进行“示范性验证”，在文中增加了一个根据“真实自我”理论筛选传主的例子。具体改动如下（见正文 3.1 部分标蓝字段，pp. 7-8）：

……二是选择依据是基于对人物的熟悉程度，还是基于对某一理论视角的兴趣。如陈雪仪(2021)因在课堂上学习了林徽因相关的内容后，被其所散发的“生命光芒”吸引而进行的心理传记学研究，是基于对人物的熟悉程度。理论选择则是在研究者明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寻找契合这一理论立场的传主开展研究。如王泽钰(2022)因其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倾向而对封建社会中站在权力巅峰的武则天和慈禧情有独钟，便是在理论视角指导下的多传主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

当研究者基于对人物的熟悉度选择传主时，并不需要大语言模型的参与，因为传主是已经确定的。而基于理论视角选择传主时，人工智能便可以帮助研究者初步筛选出与该理论相关的传主。例如，我们想要寻找与“真实自我”理论相关性较高的传主，通过将要求输入大语言模型，其给出了辜鸿铭、维特根斯坦、张爱玲等人物。这种从海量数据中进行筛查的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技术可以“将传统的语言生成模型与外部知识源相结合，提升大语言模型的检索能力”(秦小林 等, 2025)，根据研究者的标准，从海量信息中初步筛选出可能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实这些人物的成长经历，以确定是否适合做为自己研究的传主。尽管其给出的结果存在一定误差，但无疑大大减少了研究者从无到有确定传主的工作量。

**意见 2：**该部分还提到：“在初步确定传主后，需要收集与该传主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分析处理。…大语言模型可以帮助研究者确认该人物是否适合作为研究的传主”。这是理论选择还是直觉选择？这是理论选择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吗？该段中提到用 DeepSeek 给宋高宗

赵构的心理传记研究选择真实可靠的资料做辅助参考，从逻辑上来看，这部分内容应该放在“2.3 资料的选择与分析”部分比较好，放在“2.1 选择传主”部分，感觉逻辑上有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于您提到的“这是理论选择还是直觉选择？”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一步骤。原文中此处表达的意思是：在研究者确定好传主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帮我们查找与传主相关的资料有哪些，其中又有多少是研究者有能力获取到的，这些资料的数量将会决定我们能否对该人物展开研究。因此，在这一步骤中，大语言模型只涉及到通过其高效的资料检索能力来帮助研究者提高寻找传主资料的效率，而不涉及传主的选择。我们在原文中没有说清楚的是，确定传主和运用大语言模型确认其是否适合研究，已经算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因此，这一部分不涉及人工智能在理论选择中的应用。正是基于以上思路，原文才把运用 DeepSeek 检索宋高宗赵构资料的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重新调整了文章的逻辑框架，原文中的第二部分“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的应用可能”这一章节，不再以“悬疑性问题”心理传记分析模式的步骤呈现，而是以大语言模型的特点进行了优势梳理，从而解决了“用 DeepSeek 给宋高宗赵构的心理传记研究选择真实可靠的资料做辅助参考”在原文中存在的逻辑不通问题。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 3.2 部分标蓝字段，p. 8）：

在初步确定传主后，需要收集与该传主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分析处理。在这一阶段，“大语言模型可以在网络上抓取和储存与传主相关的大量公开资料”（潘晓英 等, 2020）。如以宋高宗为传主，要查找有哪些可以研究的资料，大语言模型可以快速梳理出与该传主相关的社会背景、基础史料、核心研究著作等资料清单（如表 1 所示，关于资料的真实性问题见附录 B），帮助研究者迅速评估资料的丰富性与可获得性。尽管其输出的资料内容可能存在虚构书目等现象，但其提供的结构化信息框架，能显著提升研究者进行资料核验与可行性判断的效率，将研究者从漫无目的的泛读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有针对性的精读与验证。

**意见 3：**“2.2 提出悬疑性问题”部分，作者认为悬疑性问题是指传主生命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常人难以理解之事或有限条件下取得常人难以成就的事业(谢霞, 2022)。悬疑性问题只是这三个方面吗？其他人是否也有提出不同的内容？例如，郑剑虹、舒跃育对悬念性问题的看法？该部分提到“如主题建模、注意力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矛盾检测等技术”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应用于悬念性问题的提出，请举例？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提出悬疑性问题，文中以李清照的研究为例，似乎是验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的悬念性问题与研究者提

出的悬念性问题差不多。悬念性问题具有客观性，也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能强烈吸引研究者探个究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悬念性问题的提出，如何解决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或者说人工智能技术提出的悬念性问题是人工智能作为智能体的主观性还是一个客观性问题呢？文中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适度的探讨分析。这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悬念性问题的意义，即悬念性问题是解决科学或学科问题，还是解决研究者的个人问题，特别是采用互为主体模式进行研究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提到的“关于悬念性问题的确定”这一问题确实是我们的疏忽，为此深表歉意。原文只引用了谢霞关于悬念性问题的表述，本来是想要帮读者更好地理解悬念性问题的一个举例，但似乎容易造成读者认为悬念性问题只有这三个方面的误解。这是本文作者的疏忽和不严谨导致的。在您建议的基础上，我们补充了郑剑虹、舒跃育两位学者对悬念性问题的看法。关于“主题建模”、“注意力机制”、“矛盾检测”等技术在悬念性问题提出过程中的作用，原文中以对其底层逻辑进行了说明，但似乎不够直观。在听取专家建议后，我们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举例说明，具体修改如下（详见正文 3.2 部分标蓝字段，pp. 9-11）：

在确定传主以后，如何提出一个具有张力的“悬念性问题”，是心理传记研究的核心与难点。这需要研究者深入把握传主生命中矛盾、反常与震撼之处，或是贯穿传主大部分生涯的“弥散性、渗透性”的问题(郑剑虹, 2013;舒跃育, 2018, p. 45; 谢霞, 2022)。大语言模型借助于主题建模、注意力机制、矛盾检测等技术，可以对传主资料进行多维度解析，发现其中隐含的异常模式(任欢, 王旭光, 2021; 张培晶, 宋蕾, 2012)。以李清照为例，运用 DeepSeek 快速读取资料的能力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主题建模技术可以通过对资料的分析进行主题聚类，识别其人生不同阶段的主题密度变化与中断线索。如再嫁前的词作主题以“惜春”、“伤春”为主，再嫁后以“分离”、“亡国”为主。注意力机制能够发现读者对“赵明诚临终行为”高度关注，但原文仅以“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一笔带过。“分香卖履”典故的隐含信息被高度关注。矛盾检测技术发现其《钓台》一诗表达的寻求殉国的志向与实际随朝廷南逃之间的矛盾。最终由其总结出李清照一生中在常人眼中显得“不合理”之处（见表 3），辅助研究者提出悬念性问题。

关于悬念性问题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意见激发了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在经过多次讨论后，本文作者认为，悬念性问题的确定并非完全是由研究者的主观性确定的，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即传主

身上发生的那些特殊之处本身就是客观事实，无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还是众口不一的解释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大众眼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大量文献综述的支持），而心理传记研究者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此问题尝试性的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同时，研究者在确定悬疑性问题时并不是完全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和验证，当本领域专家认可这一问题的悬疑性时，其才成为悬疑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快捷，其生成悬疑性问题的过程也是基于翔实的资料，而并非凭空产生。人工智能底层的算法逻辑也不支持其像人一样可以“灵光乍现”，其所有的输出结果都是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生成的，而不可能是其“主观性”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悬疑性问题是具有客观基础的。

关于悬疑性问题的意义问题。悬疑性问题首先回答的是传主的个人问题，之后又会在传主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一般的现实问题。因为悬疑性问题本身就是人性中固有的好奇心催生出来的。这就为从传主的悬疑性问题上升到人性的一般问题提供了基础。研究者只是在此过程中选择了更贴合自己生命经验的问题。同样，在互为主体的心理传记分析模式中，只是将研究者个人的问题更加具象化，通过对传主生平故事的研究拨动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张继元, 丁兴祥, 2013), 而这也是心理传记学的研究结果能够在一般人性的意义上给予我们启示的例证。

**意见 4:** 关于“2.3 资料的选择与分析”部分。作者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资料的选择与分析，主要是解决资料的可靠性问题和挖掘人物行为背后的意义和规律，解答传主的悬疑性问题，并进行了应用举例。但这与该部分第一段提及的“化繁就简”（这应该是资料选择的最大目的）和“以往心理传记学研究常受到批评的一点即忽视社会和历史因素”，在逻辑上有矛盾，或者说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文中需要补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在重新阅读文章后，我们发现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确实存在一定缺失，这完全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失误和不严谨，为此感到非常抱歉。经过仔细的讨论之后，本文作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矛盾。首先，这里的“化繁为简”并不是指减少收集的资料，而主要是指人工智能的归纳总结能力对重点资料的识别与提炼。正如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文章摘要的阅读来了解整篇文章的重点内容，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对该文献进行精读。其次，注重对社会背景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是促进心理传记学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增加研究者的阅读负担。但人工智能

高效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将大量背景性的资料以“化繁为简”的方式生成“摘要”，帮助研究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变相的减轻了研究者的工作量。

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对文章的整个逻辑框架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优化，关于这部分的内容表述发生了变化。具体修改如下（正文 3.2 部分标蓝字段，pp. 8-9）：

……大语言模型可以快速梳理出与该传主相关的社会背景、基础史料、核心研究著作等资料清单（如表 1 所示，关于资料的真实性问题见附录 B），帮助研究者迅速评估资料的丰富性与可获得性。尽管其输出的资料内容可能存在虚构书目等“幻觉”现象，但其提供的结构化信息框架，能显著提升研究者进行资料核验与可行性判断的效率，将研究者从漫无目的的泛读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有针对性的精读与验证。

同时，大语言模型在模式识别、立场检测(Stance Detection)算法的支持下，可以识别资料作者的倾向性(尚钰 等, 2024)，帮助研究者筛选出比较客观的传主资料，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例如，运用 DeepSeek 分别对王曾瑜(2016)的《宋高宗传》和何忠礼(2021)的《宋高宗新论》进行模式识别和立场检测，其对两书的分析结果与笔者的阅读感受和学界评论(曹家齐, 2022)基本一致（详细内容见附录 3）。但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要警惕大语言模型基于判断的标准可能受到训练数据偏见的影响。

**意见 5：**本文最大的亮点和创新性在于提出了心理传记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该部分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海量的传主文献人工智能如何处理，其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何？需要请教人工智能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以使研究框架更具有可操作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对“人机协同研究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给出了较详细的流程与步骤，并指出了每一步骤中人与机器的任务分工。但鉴于作者在跨领域（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方面的知识局限性，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的应用所带来的优势和挑战。最后提出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依然处于探索过程中，是基于本文研究而得出的一种未来研究方向的构想，是一个启示性的研究流程，远远不是一套成熟的研究指导指南。未来还需要基于更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完善这一框架。

本轮修改中删除的参考文献：

弗洛姆. (1986).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张燕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

著出版于 1962 年)

- 傅佩荣. (2011). *哲学入门*.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李武成. (2023). *命可逃乎: 余华存在焦虑下本真寻求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 刘丹. (2023-10-11). 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 p. A06.
- 罗锦钊, 孙玉龙, 钱增志, 周鲁, 王金桥. (2023). 人工智能大模型综述及展望. *无线电工程*, 53(11), 2461-2472.
- 尚人, 邹广文. (2025). 积极探寻和把控生成式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边界. *自然辩证法研究*, 41(3), 3-8+17.
- 宋小敏. (2023). *以刘邦与项羽为例的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透视中国人性格的两极*[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 王琨, 徐玉梅. (2025). 基于智能算法的医学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挑战与破解进路. *中国医学伦理学*, 38, 1-8.
- 王南湜. (2023). 从“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看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 *河北学刊*, 43(4), 74-84.
- 王斯然, 闫强. (2025). 人-AI 合作的创造性任务中个体社会惰化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15(2), 123-136.
- 郑剑虹. (2014). 心理传记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 *心理科学*, 37(4), 776-782.
- 中国心理学会. (2018).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 *心理学报*, 50(11), 1314-1322.
- Evers, J. C. (2018). Current Issues i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QDAS): A User and Developer Perspective.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3(13), 61-73.
- Fish, J., & Syed, M. (2018). Native America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 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59(4), 387-403.
- Gao, L., Biderman, S., Black, S., Golding, L., Hoppe, T., Foster, C., ... & Leahy, C. (2020). *The pile: An 800gb dataset of diverse text for language modeling*.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101.00027>
- Goodman, K. W., Litewka, S. G., Malpani, R., Pujari, S., & Reis, A. A. (2023). Global health and big data: The WHO'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uida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119(5-6), 1-4.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 Marecek, J. (2003). Dancing through minefields: Toward a qualitative stance in psychology. In P. M. Camic, J. E. Rhodes, & L. Yardley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Expanding perspectives in methodology and design*(pp. 49-6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iles, M. B., Huberman, A.M., & Saldaña, J. (201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methods sourcebook* (3rd ed). Sage.
- Rogers, L. O., Niwa, E. Y., Chung, K., Yip, T., & Chae, D. (2021). M (ai) cro: Centering the macrosystem in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65(5-6), 270-292.
- Runyan, W. M. (1978).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gner, B. R. (2020). Psychobiography is trending among psychologists. *A review of New Trends in Psychobiography Clio's Psyche*, 27(1), 140-143.

本轮修改中新增的参考文献:

- 陈晋音, 席昌坤, 郑海斌, 高铭, 张甜馨. (2025). 多模态大语言模型的安全性研究综述. *计算机科学*, 52(7), 315-341.
- 陈世华. (2022). 以假乱真与去伪存真: 自媒体欺骗行为的表征及其治理. *学习与实践*, 39(6), 132-140.
- 张继元, 丁兴祥. (2013). 弗洛伊德百年之后: “辅仁心理传记学”的继往开来.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1(1), 1-40.
- 郑剑虹. (2013). 中国大陆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及其质量结合模式.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1(1), 41-61.

- 郑翔, 杨瑞仙. (2025). AI 可以代替学者审稿吗?——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审稿意见生成与对比研究. *情报杂志*, 44(10), 1–9.
- Al-Fattal, A., & Singh, J. (2025).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human-driven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hematic analysis: A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4, 1–10.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51337870>
- Anis, S., & French, J. A. (2023). Efficient, explicatory, and equitable: Why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should embrace AI, but cautiously. *Business & Society*, 62(6), 1139–1144.
- Barrera, B., Feliu, A., Espina, C., Brand, T., Zeeb, H., & Ahmed, F. (2025). Leveraging AI to enha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case studies in cancer prevention literacy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4, 1–10.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51365766>
- Chatzichristos, G. (2025).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era of AI: A return to positivism or a new paradig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4, 1–12.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51337583>
- Cheah, C. W. (2025). AI-augmented netnography: Et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responsible digit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4, 1–11.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51338910>
- Chen, T.-J. (2023). ChatGPT and o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speed up scientific writi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86(4), 351–353.
- Chopra, F., & Haaland, I. (2023). *Conduct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AI* (CE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3-06). Center for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equality (CEBI),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https://ideas.repec.org/p/cep/cebiwp/23-06.html>
- De Paoli, S. (2024). Performing an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a large language model: An exploration and provocat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42(4), 997–1019.
- Eryaman, M. Y. (2025).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and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4, 1–3.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51400178>
- Gur, T., & Maaravi, Y. (2025). The algorithm of friendship: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grative model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4(14), 1–21.
- He, Y., & Bu, Y. (2025). *Academic journals' Ai policies fail to curb the surge in Ai-assisted academic writing*.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512.06705>
- Hitch, D.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ment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way of the futu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4(7), 595–606.
- Katz, A., Gerhardt, M., & Soledad, M. (2024). Using generative text models to create qualitative codebooks for student evaluations of tea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3, 1–19. <http://doi.org/10.1177/16094069241293283>
- Liang, P. P., Wu, C., Morency, L. P., & Salakhutdinov, R. (2021). Towards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social biases in language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6565–6576). PMLR. <https://proceedings.mlr.press/v139/liang21a.html>
- Lixandru, I.-D. (2024).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ChatGPT. *Informatica Economica*, 28(1), 57–67.
- Marshall, D. T., & Naff, D. B. (2024). The ethics of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Human Research Ethics*, 19(3), 92–102.

- Mathis, W. S., Zhao, S., Pratt, N., Weleff, J., & De Paoli, S. (2024).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of healthcar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using open-sour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How does it compare to traditional methods?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255(10), 108356.
- Mayer, C.-H., & Fouché, P. J. P. (2025). Psychobiography 4.0: About robots, AI and humanoi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37(5), 409–415.
- Navigli, R., Conia, S., & Ross, B. (2023). Biase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Origins, inventory, and discussion.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15(2), 1–21.
- Perkins, M., & Roe, J. (2024).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with ChatGPT. *Journal of Appli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7(1), 390–395.
- Tschisgale, P., Wulff, P., & Kubsch, M. (2023).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methods in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A case for computational grounded theory.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19(2), 020123.
- Xie, X., Shu, Y., He, C., Zhang, Y., & Ren, X. (2025). How individuals 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overcome crisis of self-development: A psychobiographical exploration of Li Qingzhao and her female self-awakening.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36. <https://doi.org/10.1080/10720537.2025.2561148>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修回稿在初稿基础上有明显提升，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题主线更加清晰。引言部分已经用一个主问题和三个子问题明确界定了本文的目标，后文各部分标题与内容基本做到了与这些问题一一对应，摆脱了初稿中“教科书式+论 文式”并行的松散结构。

2.文献综述更具结构化与“版图感”。新增的“大语言模型为质性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节，通过表格系统呈现 LLM 在质性研究不同环节的功能与风险，使读者能“一眼看到这个领域目前在做什么、有哪些缺口”，为后文转入心理传记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3.创新点呈现更为显性。本土文化语料驱动的循环范式、心理传记领域的 AI 伦理准则、研究者主导的人机协同框架三点创新，已经在摘要、正文结构与图示中得到清晰标出，并与前文案例分析形成较好的互证关系。

4.方法论与操作层面的交代更加充分。对于 DeepSeek 等模型在李清照、宋高宗等个案上的使用，修回稿通过脚注和附录，将其界定为“启发式示范”，并说明模型版本、调用方式和结果评估标准，增强了可理解性与透明度。

总体来看，修回稿已经从“有想法但结构略散”的稿件，发展为一篇站位前沿、问题意识鲜明、与心理传记学高度贴合的综述评论，基本具备发表条件。以下建议主要是进一步打磨的层面。

**意见 1:** 适度压缩第三部分中个别示例性段落，增强论证的“代表性”而非“堆叠感”。

当前第三部分在“快速定位备选传主”“高效收集可能资料”“提出悬疑性问题”等小节中，示例丰富，这是优点。但部分段落叙述较长，可以考虑：

每个小节保留 1-2 个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技术优势+固有局限”的例子（如李清照、宋高宗），对其他相似度较高的小例子可压缩为一句话“略述”，以提升整体紧凑性。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清晰的修改思路。为提升全文的紧凑性与论证的集中度，本次修改对第三部分各小节的内容与结构进行了系统性地梳理与整合。

在 3.1 部分，简化了陈雪仪、王泽钰等基于个人兴趣或理论立场选择传主的背景性案例，将论述重点聚焦于展示大语言模型如何辅助基于理论视角的传主筛选。

在 3.2 部分，明确将宋高宗的案例保留并进行了扩充，用以完整展示 AI 在“高效收集与整理资料”方面的能力；同时，将李清照的案例系统性地整合至新建的 3.3 小节，通过连贯叙述其多项技术分析流程，集中论证 AI 在“辅助提出悬疑性问题”中的具体作用与内在局限，并以人类研究者的深度追问作为转折，清晰划分技术与思想的边界。

原 3.3 小节（现 3.4）在内容上删除了关于理论储备耗时的一般性论述，使行文更直接切入 AI 提供多元理论备选方案的核心功能。

原 3.4 小节（现 3.5）调整了开篇结构，将人类的理论创新作为标杆前置，并将 AI 对“李清照为何再嫁”问题的检验过程（匹配、对抗、比较）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案例叙述，具体分析内容则移至附录 E 以保障正文的流畅性，最终明确对比了 AI 的工具性价值与研究者的主体性责任。

原 3.5 小节（现 3.6）则将原先零散列举的写作辅助功能，归类为“语言与结构优化”与“论证逻辑检验”两个层面进行概述，并聚焦于 AI 优化逻辑与心理传记学根本任务之间的冲突，再次以“李清照”这一异质个体为例深化批判，最终落脚于 AI 反向激发研究者主体性自觉的深层价值。

部分修改内容示例（见正文第三部分标红字体）：

……如陈雪仪(2021)对林徽因的研究是基于对人物的熟悉度，而王泽钰(2022)对武则天和慈禧的研究则是基于其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

……如以宋高宗为例，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可贯穿从资料普查到文本倾向性评估的全过程。首先，在资料收集层面，研究者仅需输入基本指令，模型便能依托其内嵌的广泛知识库

与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快速生成一份结构化的资料索引清单（如表 2 所示）。这份清单系统地涵盖了传主所处的宏观社会背景、核心史料，以及当代重要的研究专著，从而迅速勾勒出研究的资料版图，极大提升研究者评估资料丰富性与可获得性的效率，使其能将精力从漫无目的的泛读转向目标明确的精读与深度验证。更进一步，在初步资料整理之后，大语言模型可借助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与立场检测(Stance Detection)等算法，对具体文献的内容倾向性进行初步判断(尚钰 等, 2024)。

**意见 2:** 对大语言模型能力的表述可再略作“降调”，避免被误解为过度乐观。

修回稿已经加上了对“启发式示范”的限定，但在个别表述中仍容易给读者留下“LLM 在某些环节已近似于可靠‘共作者’”的印象。建议在少数关键句中再次强调：

该研究基于某一具体模型与具体知识库配置，不宜简单外推到所有模型和所有心理传记研究情境：

在理论创新与深度诠释层面，当前 LLM 更适合作为“假设生成器”和“盲点暴露者”，而非“理论的最终裁决者”。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本条建议，我们在文章第三部分每一小节结尾和结语部分，对涉及到的大语言模型能力，多次强调其应用的局限性和工具性。例如：

3.1 部分的结尾：“大语言模型的‘高效’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它将研究者的探索，从一种充满个人洞察的‘主动追寻’，部分地转变为对算法给出的、符合公共叙事的清单的‘被动筛选’。因此，研究者必须警惕，避免自身的研究目的被技术的可见性框架悄然塑造。”

3.2 部分的结尾：“大语言模型在这一阶段所提供的，是一个需要研究者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严格核验、补充与批判性修正的参考资料库。它将研究者从信息的‘搬运工’角色中解放出来，但对其成为更精明的‘鉴定者’与‘分析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3.3 部分的结尾：“大语言模型的强项在于对悬疑性问题的客观基础（即历史事实、行为矛盾、集体困惑）进行‘资料与模式的重组’与高效提示；而悬疑性问题最终得以被‘看见’并赋能的‘情感指向与存在性投入’，则完全依赖于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生命经验与文化共鸣，这是技术无法涉足的领域。”

3.4 部分结尾：“研究者的角色应从‘理论消费者’转变为‘理论的批判性对话者与再创造者’，必须对大语言模型推荐的理论进行历史化、语境化的检视，并在理论与生命经验的碰撞中，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框架。”

3.5 部分的结尾：“大语言模型在此环节更适合作为一个‘假设生成器’和‘盲点暴露者’，迫使研究者更清晰、更严谨地陈述和捍卫自己的理论选择与创造。研究者的认识论优势，最终必须体现在这种超越算法规则的创造性的理论建构能力上。”

3.6 部分的结尾：“大语言模型‘优化’的最高价值，在于反向激发研究者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主体性的不可替代。”

结语部分：“……本研究结果仅基于大语言模型 DeepSeek 与 ima-AI 智能体所得出的个案，不宜简单、直接外推至其他大语言模型或所有心理传记研究情境中，而需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结合研究内容与应用模型进行实际的操作验证。在理论创新与深度诠释层面，当前的大语言模型更适合作为一个‘假设生成器’和‘盲点暴露者’，辅助拓宽研究者的视野，而非‘理论的最终裁决者’。”

**意见 3：**适度强化对“互为主体模式下悬疑性问题”的讨论收束。

修回稿已经补充了郑剑虹、舒跃育等关于悬疑性问题的观点，也讨论了主观性与客观基础、研究者自身生命经验的卷入。建议在该部分末尾用 1 段话进一步收束：

明确区分：

- 1) 悬疑性问题的“客观基础”（历史事实与集体困惑）；
- 2) 研究者在互为主体模式中对问题的“情感指向与存在性投入”；
- 3) LLM 能协助的是对前者的“资料与模式重组”，而对后者（存在性投入）则无能为力。

如能用一两句话点明这种“本体论角色分工”，会进一步凸显心理传记学的独特价值。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在阐述完李清照的例子后，接着指出了大语言模型对于资料的深层分析存在的局限性。表明大语言模型只能实现对客观现实的排列重组，却无法洞悉研究者对于悬疑性问题的“情感指向与存在性投入”。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 3.3 部分结尾处标红字体）：

……大语言模型的介入，迫使我们必须从本体论层面澄清“悬疑性问题”的构成。其一，是其客观实在性基础，即源于传主生平与时代背景的历史事实、可观测的行为矛盾及引发的集体困惑；其二，是其诠释学意义上的生命力，即研究者基于自身生命体验、理论素养与文化共鸣而对问题产生的“情感指向”与“存在性投入”。正是后者，赋予了悬疑性问题以独特的“问题性”，使之从一个事实罗列升华为一个值得追问的学术命题。大语言模型作为高

效的工具，能够高效处理前者，重组“事实网络”；但对后者的“意义赋予”则无能为力。这定义了人机协同的本体论分工：大语言模型拓展研究者认知的广度与处理效率，研究者则肩负起对意义的定位、诠释与理论创造。心理传记学最深层的价值，正体现在这种唯有人类主体方能完成的、从事实到意义的创造性跨越之中。

**意见 4：**人机协同流程图可再加一句简短说明“此为初步构想”。

目前流程图已经较为清楚地区分了“人主导/机辅助”的环节。建议在图题或正文引介处补一句，如“该框架为基于现阶段探索形成的初步构想，尚需后续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细化”，既体现谦抑态度，也防止读者误读为“标准流程”。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本次修改中，我们在人机协同研究流程图后，新增了标注（注 2），以表明该流程图的探索性质。同时，在 5.3 部分的结尾，重申了本文中人机协同研究框架只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际的调整和验证。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图 2 标红字体）：

注 2：本流程图及框架为基于现阶段探索形成的初步构想，其有效性与普适性尚需后续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细化。

……最后，以上人机协同研究流程是基于本文中采用的“悬疑性”问题分析模式而提供的一个参考框架和初步探索。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反思和伦理敏感性，始终保持对研究问题、理论视角、解释框架的主导权，根据研究的不同目的、不同阶段，对人工智能的介入程度与时机进行灵活调整，以进一步完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及其实践路径。

**意见 5：**对个别术语和缩写再做一次统一性核查。

修回稿在术语统一方面已有大幅改进。建议在终稿前再整体浏览一次，重点核查：

“大语言模型/预训练大模型/LLM”首次出现处是否均有中英文对照，后文是否尽量用同一简称；

“悬疑性问题/悬念性问题”等提法是否完全统一（建议全篇使用同一术语）；

图表编号、附录编号与正文引用是否一一对应。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对全文修改完成后，对于专业术语的中英

文对照、术语统一性、图表编号、附录编号、引用等内容进行了多次核查，以确保尽量避免出现此类错误。部分修改如下（见正文标红部分）：

（1）在引言部分，对第一次出现的“大语言模型”一词，增加了英文名称及其缩写“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2）核查全文后，统一使用“悬疑性问题”。

（3）将 3.1 部分第一段中的部分“人工智能”术语，根据语境调整为“大语言模型”。

（4）将页码范围符号调整为正确的“-”符号。

（5）对附录部分的格式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附录名称、调整了附录 B 中的表格序号。

**意见 6：** 结语部分可以稍微“压缩抒情，强化提炼”。

现在的结语已经能把三条路径与心理传记学的学科使命联系起来。可考虑在最后一段用 3-4 句短句，将全文的“一个主问题+三条路径”再做一次高度概括：

例如：“简要重申：在 AI 时代，心理传记学的独特价值仍在于……；大语言模型的不可替代之处与不可取代之处分别是……；本土语料库、伦理准则、人机协同框架只是一个开端，真正决定心理传记学未来的，仍是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与人文关怀。”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清晰的修改思路。通过综合考虑之前的建议，我们在结语部分再次重申了大语言模型的功能定位，并对全文“一个主问题+三条路径”进行了再次的总结概括。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第六部分标红字体）：

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心理传记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研究中的技术优势与潜在挑战，提出了本土化语料库驱动下的大语言模型循环研究模式、大语言模型在心理传记学中应用的伦理准则，以及研究者主导下的人机协同研究框架，深化了对大语言模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理论思考，肯定了人是研究中的主体，人工智能只是辅助工具的角色定位，为学科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但与此同时，本研究结果仅基于大语言模型 DeepSeek 与 ima-AI 智能体所得出的个案，不宜简单、直接外推至其他大语言模型或所有心理传记研究情境中，而需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结合研究内容与应用模型进行实际的操作验证。在理论创新与深度诠释层面，当前的大语言模型也仅适合作为一个“假设生成器”和“盲点暴露者”，辅助拓宽研究者的视野，而非“理论的最终裁决者”。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的介入并未改变心理传记学的核心价值：通过对异质个体生命的深

度诠释，照亮人性的复杂与独特。大语言模型的优势在于效率提升与模式识别，其不可逾越的局限在于意义生成与理论创造。本文提出的本土化语料库、伦理准则和人机协同框架，仅是对人工智能时代下心理传记学方法论探索的开端，真正决定心理传记学未来的，始终是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与人文关怀。

**综合意见：**综合来看，修回稿已经充分回应前一轮审稿意见，在结构、综述深度与方法论创新上均有明显进步。现在的稿件在“AI 时代的心理传记学方法论反思”这一主题上，已经具备较强的前沿性、系统性与引领性。

建议仅在上述细节层面进一步打磨语言与少量段落结构，即可形成较为成熟的终稿。当前综合处理意见为：发表或修后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以及对本文的认可和鼓励，特别对您所提出的有助于完善本文的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深表感谢！

.....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进行了创新性的修改，文章修改后的质量显著提升。有两点意见，供作者进一步修改参考：

**意见 1：**修改稿第 35 页提到“例如，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在选择传主时更倾向于推荐西方的历史名人，而鲜少推荐西方国家以外的非凡人物。”请引用这句话的依据，DeepSeek 是中国人开发的大语言模型，为何有西方价值观倾向？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关于 DeepSeek 偏向于推荐西方人物这一点，是研究者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现的，但并未补充相关的资料进行支持，为此疏忽感到非常抱歉。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作为一款优秀的中国模型，DeepSeek 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高质量的中文语料，也展现出了优秀的中文应用能力。但全球范围内科学性和验证性最强的语料资源主要源自英语学术资料库，而非英语语料则相对不足，尤其是优质中文语料的稀缺(周利生, 刘芳华, 2025), 导致一些模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框架(王均松, 2025), 在结果生成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西方文化占主导的现象。因此，

尽管 DeepSeek 是由中国团队开发，但其训练数据可能广泛涵盖全球互联网文本，受英语语料及西方主流叙事影响，从而在推荐中体现出潜在的文化偏向。基于此，我们对原文中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并引用了相关文献进行支撑。具体修改如下（见正文 4.1 部分标红字体）：  
……例如，由于训练数据中英语资料占比较大，导致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在选择传主时，推荐的外国名人往往多于中国名人(王均松, 2025; 张晨晓, 2025; 周利生, 刘芳华, 2025)。

**意见 2:** 人机协同研究模式的提出有创新性，通过作者的修改完善，其流程的逻辑性更加清晰，操作性更强，但还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两点：一是传主资料的筛选与处理，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如何将心理传记学已有的资料筛选理论（如原型情景理论、凸显性指标、成长性关键因素）结合进去进行思考；二是悬念性问题的提出（也包括传主的选择）具有研究者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即研究者之所以将传主生命故事中的某个或某些事件和经历作为悬念性问题去思考，可能是因为这个悬念性问题与研究者的生命故事和性格有关联，因此，人机协同研究模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在流程图的表述中有所涉及和思考。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在本次修改过程中，基于我们在心理传记学研究过程中的发现和反思，重新对人机协同研究框架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5.3 部分标红字体和图 2）。

1.关于资料的筛选与处理：我们重构了流程的步骤“**（4）研究者定义分析维度并微调模型**”。现在，研究者首先需要将心理传记学中已有的资料筛选理论（如凸显性指标等），按照其核心概念和操作性定义，转化为指导人工智能工作的具体规则。例如，基于“原型情景理论”，可提取描述“反复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场景（如‘黄昏独酌’）”的所有文本片段。这些规则通过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注入模型，从而确保后续的自动化处理从属于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实现“理论引导技术”。例如，通过让大语言模型扮演一位资深的心理传记学研究者，将心理传记学的相关知识输入大语言模型，再将需要用到的资料筛选理论投喂给大语言模型，针对该理论的每一个核心概念，以例子的形式让其学会如何进行判断，从而实现已有筛选理论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同时，该框架为基于现阶段探索形成的初步构想，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尚需经研究实践进行进一步检验和细化。

2.关于研究者主观性与悬念性问题：在“**（6）确定悬念性问题，设定分析框架**”步骤，研究者可以根据之前的资料分析结果，让大语言模型提供传主身上的悬念点，再结合研究者自身对传主的理解和理论素养，确定要研究的悬念性问题。再基于大语言模型跨领域知识图

谱的优势，生成一份备选的解释理论清单，研究者可以此为参考，设定后续的编码分析框架。从而整个研究框架既不失去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性思考，又结合了大语言模型对资料客观分析的优势，实现了人与机器的主客观互动。而“（7）人工核查编码准确性和理论契合性”步骤，便是一个理论与资料相适配的动态过程。经过一次或多次的循环适配后，研究者可能得到一个与传主基本适配的理论框架。若理论与传主不契合，则需返回步骤（6），重新设定理论分析框架。到了“（8）深层心理分析、悬疑性问题解答与理论发展”步骤时，研究者需要将此框架再放回到传主的生命历程中，解释其悬疑性问题背后的心理因素。同时，对传主资料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已有理论之间的差异，便很可能是该理论得以发展的关键点。研究者可基于此进一步发展或厘清该理论的应用范围。最后再对研究结果进行三角验证，并生成研究报告。

本次修改过程中新增的参考文献：

周利生, 刘芳华. (2025). 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意识形态治理的价值、风险与应对.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56(2), 40-49.

王均松. (2025-12-10). 警惕大语言模型的语用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 A09 版.

<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6859&eid=49246&sid=228029>

张晨晓. (2025). 突围与博弈：从 DeepSeek 现象看大语言模型时代文化自信的建构.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37(4), 103-107.

---

### 第三轮

**编委 1 意见：**文章及修改说明已全部看过，没有问题，可送终审。

**编委 2 意见：**这篇文章修改得不错，我没有更多的意见了，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稿件经过多位专家的审阅，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达到了发表水平，同意发表。